

周晓虹 谢曙光 / 主编

中国研究

本期焦点·乡村治理

后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下的小农经济模式及其全球化境遇

——以安徽园村为个案

董国礼

刘谨

项目制重塑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机制分析

——基于浙西北Z乡的调查

王裕根

城镇化中农民行动策略及其逻辑

吴业苗

当代中国人际关系变迁：从重情感到讲理性？

——以同学关系「变质论」为切入点

张波

「有闲阶级」女性的身体资本建构

王蕾



封面题字：金耀基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音序排列）：

Anagnost, Ann（美国华盛顿大学）
边燕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Christiansen, Flemming（英国利兹大学）
Duara, Prasenjit（美国芝加哥大学）
范可（南京大学）
风笑天（南京大学）
Friedman, Edward（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关信基（香港中文大学）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
Houlden, Gordon（加拿大爱尔伯特大学）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加加美光行（日本爱知大学）
金光亿（韩国首尔大学）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强（清华大学）
李友梅（上海大学）
林南（美国杜克大学）
刘宏（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马戎（北京大学）
Mohanty, Manoranjan（印度德里大学）
Perry, Elizabeth（美国哈佛大学）
乔健（台湾东华大学）
Stafford, Charles（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Unger, Jonathan（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Vogel, Ezra F.（美国哈佛大学）
汪晖（清华大学）
王庚武（新加坡国立大学）
谢寿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阎云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
园田茂人（日本东京大学）
翟学伟（南京大学）
张玉林（南京大学）
周大鸣（中山大学）
周晓虹（南京大学）
周怡（复旦大学）

主编：
周晓虹 谢曙光

编辑部主任：
周培勤

编辑：
杨渝东

陆远
郭未

英文编辑：
秦晨



CHINA STUDIES No.23



周晓虹
谢曙光 / 主编



中国研究

2019年第23期

发 刊 词

作为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可以看作 1949 年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横空出世所引发的一种必然的学术反应。而当 1978 年由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第二次革命”兴起之后，这门首先发端于“西方”的学术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研究阵容不断壮大，尤其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了对其生活其间的社会的研究；二是逐渐脱离了冷战时期作为“中国观察学”所带有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并在近十年以来显示出走向繁荣的迹象。

不过，考虑到“渐进式改革”所引发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景观的剧烈变迁，考虑到中国社会空间固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科学的“中国研究”似乎才刚刚起步。与这个巨大有机体浓缩了 19 世纪、20 世纪和 21 世纪三个世纪，凝聚了农业、工业及“后工业”三种社会的博大厚重相比，与它的庞大的人口及其散发的无尽的能量相比，与它的让人兴奋又令人困惑的矛盾性相比，现有的中国研究依然显得单薄、单调和单纯。从能够切近它的适当的研究方法，到足以解释它的经得住验证的理论，都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从对于其制度和状况的具体描述，到对于其文化和哲学的抽象归纳，也依旧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决定出版《中国研究》。这份在中国本土编辑的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客体的学术刊物，将成为中国学界面向全球的开放的学术园地，承担起海内外学术同人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为促进中国研究领域的日益精进而努力。

《中国研究》将本着开放和务实的精神，坚持宏观视野和问题取向。这是它的办刊宗旨。

开放性是指它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中国研究》将努力突破单一学科的局限和研究领域的禁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都既属

于它的研究范围，也成为它的研究视角。开放性同时也包括研究主体（研究者）的多样性，不同学术背景和志向的学者，只要他（她）坚守学术共同体所公认的伦理规范，将得到同样的尊重。需要强调的是，鉴于学术界目前的状况和学术事业发展的考虑，我们特别鼓励和支持学术新人的艰苦劳作。

务实性是指它的实证性和经验性。《中国研究》奉行“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希冀重点置于中国的基层社会，从微观的问题或现实经验入手，在对许多单个领域、地域进行切实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追求最终的对中国社会整体的通透认识。它当然期望博大而混沌的中国最终能产生宏大而精确的理论，但也努力避免“宏大理论”先行或抽象概念主导下的天马行空式的空谈。务实性还表现在鼓励朴实平易的文风和学风，倡导平和的学术批评氛围。

《中国研究》属于全球中国学界展示睿智的公共空间，而不是少数编辑、学者的封闭领地。为此，我们热切希望整个中国学界的广泛参与，希望有广泛而深层的互动。同时，我们也真诚欢迎来自学术界的监督和批评。这种严肃的监督和批评是《中国研究》健康成长的重要前提。

《中国研究》编辑委员会
2005年5月

目 录

主题研讨 后集体时代的乡村治理

后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下的小农经济模式及其全球化境遇

——以安徽园村为个案 董国礼 刘 谨 / 1

项目制重塑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机制分析

——基于浙西北 Z 乡的调查 王裕根 / 35

弱竞争性选举、权力结构固化与村治失效

——以 W 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为例 易文彬 吕 铸 / 54

城镇化中农民行动策略及其逻辑 吴业苗 / 64

草场资源的管理与集体行动的达成

——以青海省藏区 Q 县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的发展为例 ... 郭海青 / 88

学术论文

从“国家化”到“去国家化”：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演变进路与机制

——基于 1949~1998 年《人民日报》的文本分析 赵晔琴 / 110

当代中国人际关系变迁：从重情感到讲理性？

——以同学关系“变质论”为切入点 张 波 / 129

另一种信任格局：互联网消费中的信任构建 杜世超 / 142

解构食品安全话语：中国主流媒体视野中的“有机农业”研究

..... 李雪石 陈 欢 / 161

“有闲阶级”女性的身体资本建构..... 王 蕾 / 179

书评与随笔

追忆论坛内外的京都..... 陈 勇 / 203

《中国研究》稿约..... 218

Table of Contents & Abstracts..... 220

后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下的小农经济 模式及其全球化境遇

——以安徽园村为个案*

董国礼 刘 谨**

摘 要：20 世纪 80 年代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的经营模式。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借助 20 世纪 90 年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契机向城市转移，以商品化的劳动为要素参与到市场经济发展链条中，并使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外出务工的经历使农民接受城市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洗礼和影响，逐渐形成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小农经营模式的农业生产无法支撑农村家庭持续存在和再生产，同时也满足不了现代化生活方式的需求，而这一切的延续需依靠农民的打工经济。依赖于市场结构和全球化经济的农村打工经济成为农村经济的主要支撑，缺乏内部自生性的农村经济因受市场经济制约而难以摆脱其脆弱性。

关键词：后集体土地产权 小农经济 消费 全球化

一 研究背景：农业经济模式及农民经济状况的演变

1. 我国农业发展模式的演变

“小农”是对中国传统农业经营方式的一个恰当表述，延续数千年的

* 本研究系国家重点课题“农地产权改革与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研究”（课题编号 17ASH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董国礼，历史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dguoli@ecust.edu.cn）；刘谨，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自然经济，维持着传统的小家庭经营单位。在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英国农村变迁方式应该是农业发展的典型代表，即小农分化为农业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而农业则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而现代化（黄宗智，2000a）。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制度、现实原因，中国的农业发展并没有也不可能按照英国农业的发展道路前进。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分析了中国的农业发展和农村社会在近代化的背景下是如何变迁的。在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下，“内卷化”或“过密化”是我国小农经济的显著特点，是指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华北的农业经济随着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边际报酬递减的现象，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种“无发展的增长”的农业经营模式并没有伴随着国际资本主义的到来而发生质的变化，只是小农经济进一步过密化。在集体化和农业部分现代化的情况下，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之前，农业发展的过密化现象仍在持续。西方小农分化的过程是农村经济的全面转化，即向现代农业发展，而中国农村的发展是在小农经济内部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分化的小农经济。

传统经营模式使我国农业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农民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同时具有一种脆弱性。土地是农业生产中的关键要素，同时要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和适宜的农业生产技术。1949年后，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经历过家庭经营和集体化的合作模式，为了改变传统落后的农业经营模式和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1978年的农村改革实施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制度，变革了集体化生产的模式，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经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发展。在土地承包制度下，广大农村的家庭土地面积小，类似于一种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在这种状况下，许多农民家庭依然维持旧型农业的耕作模式。平均分配的土地经营权使得农民家庭经营的土地分散且细化，只能持续一种小农经济的经营模式。温铁军（2009）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判断是这样的：“无论是1980年代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1998年以后改称为‘家庭承包制’，其实都是当代人对如何描述‘小农经济’的一种话语上的努力；小农经济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

1978年之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去集体化的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发展，改变了集体化农业发展的弊端，同时变革了传统的小农经营模式。但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授克里斯·布拉莫尔（Bramall）指出，“去集体化有助于重新塑造解放战争前的农业格局”（Bramall，2009：343），因为“在去集体化的过

程中，中国农民阶级是被加强了，而非被削弱了”（Bramall and Jones, 2000: 262）。

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已非常明朗，而且在加入了 WTO 后，与国际市场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但是我国农业发展并没有出现西方的农业发展模式。面对这一问题温铁军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农业大国，因为农业大国一般都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占有比较大的份额。中国其实是一个小农国家。”（温铁军，2000）小农国家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人口众多，土地所承载的农民人口压力过大，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退化，生存保障功能上升。中国有 14 个省份人均耕地面积低于 1 亩，在这些地方土地已经几乎失去了生产资料功能，而仅仅具备生存保障功能。其中又有 6 个省份人均耕地面积低于 0.5 亩，在这些省份，土地连生存保障功能都不能发挥了，更遑论生产资料功能。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也是一种制度的变革，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种促进作用是否长久持续存在以及制度变革是否真正改变了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弊端与障碍，才是促进农业长效发展的关键。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农村改革，即从集体耕作制向以单个家庭为基础的个体耕作制转变的制度变迁，是 1978 ~ 1984 年农业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当然作物类型的变化、国家牌价和市场价格的变化、生产要素的投入、农业技术使用等也是农业增长的原因。他同时也分析了在 1984 年之后产出放慢的原因，除了向家庭责任制转变所产生的一次性突发效应在 1984 年已释放完，还有在现有的土地产权集体化的背景下，农民只拥有土地的承包权或流转权且人多地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当农业发展处于停滞的状态，农民无利可收，以及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就会抑制农户对农业生产的资本投入意愿（林毅夫，1993）。

2. 农民经济状况及消费方式的变化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增加了农民的家庭收入，而且外出务工收入对农民家庭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也越来越高，逐渐形成半工半耕的家庭经营模式。在收入增加的同时，农民的消费状况也在发生变化，各项消费支出可反映农村家庭生活方式的变化。农民务工收入的增加、外出务工的经历、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也在影响着农民的消费状况。下面就针对农民的家庭收入及支出状况进行分析（见表 1）。

表1 1990~2013年农村居民家庭收入

单位:元

项 目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人均纯收入	686.4	1577.8	2253.4	5919.0	6977.3	7916.7	8895.9
工资性收入	138.8	353.7	702.3	2431.1	2963.4	3447.5	4025.4
家庭经营性收入	518.6	1125.8	1427.3	2832.8	3222.0	3533.4	3793.2
财产性收入	29.0	41.0	45.0	202.2	228.6	249.1	293.0
转移性收入		57.3	78.8	452.9	563.3	686.7	784.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按照收入的来源可将农民的纯收入表示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之和。工资性收入指农村住户成员受雇于单位或个人,靠出卖劳动而获得的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指农村住户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生产筹划和管理而获得的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是传统农业收入,其他三类是非农收入。由于本研究所提及的务工收入主要是农民除去农业收入以外通过自己的劳动在非农就业领域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也就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表1中的工资性收入与本文研究的打工收入无太大差别,不影响本文的数据分析。

从表1中可看出,1990~2013年,农民的家庭人均纯收入是每年都在递增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增长点,或者说工资性收入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是越来越高的。表2是1990~2013年农民家庭支出状况的分析,从中可看出农民人均消费支出也是逐年增长的。食品类的消费占家庭总支出的主要部分,但是在家庭支出中的比例是逐年降低的,从对人均消费支出构成表的分析中可看出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的支出在增加(见表3)。除此之外,外出务工的经历对农民家庭消费观念的现代化、消费方式及消费结构的变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表2 1990~2013年农民家庭支出状况

单位:元

项 目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人均消费支出	584.6	1310.5	1670.1	4381.8	5221.2	5908.1	6625.6
食品	343.8	768.2	820.5	1800.7	2107.3	2323.9	2495.5
衣着	45.4	89.8	96.0	264.0	341.3	396.4	438.3

续表

项 目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居住	101.4	182.2	258.3	835.2	961.5	1086.4	1233.6
家庭设备及用品	30.9	68.5	75.4	234.1	308.9	341.7	387.1
交通通信	8.4	33.8	93.1	461.1	547.0	652.8	796.0
文教娱乐	31.4	102.4	186.7	366.7	396.4	445.5	486.0
医疗保健	19.0	42.5	87.6	326.0	436.8	513.8	614.2
其他	4.3	23.1	52.5	94.0	122.0	147.6	174.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4》。

表 3 1990 ~ 2013 年农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构成

单位：%

项 目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食品	58.8	58.6	49.1	41.1	40.4	39.3	37.7
衣着	7.8	6.9	5.7	6.0	6.5	6.7	6.6
居住	17.3	13.9	15.5	19.1	18.4	18.4	18.6
家庭设备及用品	5.3	5.2	4.5	5.3	5.9	5.8	5.8
交通通信	1.4	2.6	5.6	10.5	10.5	11.0	12.0
文教娱乐	5.4	7.8	11.2	8.4	7.6	7.5	7.3
医疗保健	3.3	3.2	5.2	7.4	8.4	8.7	9.3
其他	0.7	1.8	3.1	2.1	2.3	2.5	2.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4》。

由表 1、表 2、表 3 可看出，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民的家庭消费支出也随之增加，但是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是不能满足消费支出的，从而反映了在现有的农业经营模式下，农业收入偏低，传统自给自足的经营模式不能维持农民家庭的基本生活。农民需要依靠务工收入维持家庭的日常开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城市和市场为其提供就业机会、收入来源，因而也会受市场经济的制约。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实行的以“分田到户”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然维持着农地的细碎化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业的规模化进程（杜润生，1988：6）。土地的细碎化是当前小农经营的一个表现。

从微观上讲，这种经营模式不利于农民家庭持久稳定的生存，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从宏观上讲，这种模式的长期维持会威胁国家的粮食安全。外出务工模式下的农民家庭收入和消费状况对市场的依赖性较强，

被绑定在全球经济的链条之中，但在市场环境或全球经济链条之中缺乏自足的能力，会受其制约。

二 研究视角：后集体土地产权、小农经济、消费方式变迁

1. 后集体土地产权背景下的土地流转模式及其绩效

本文将家庭承包制的土地经营模式理解为后集体土地产权，这是相对于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化而言的，由于国家及地方上的代理人实际控制土地产权，目前的土地经营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小农经济模式的特征。从产权的理论出发，我国现有的集体产权存在产权主体模糊不清的状况，土地作为一种资源和生产要素不能流入市场，同时农民即使拥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土地的使用模式，我国农业经营依然维持小农经营的模式也不无道理，且经济绩效低下的私人代理的土地流转模式在中国大量存在（董国礼、李里、任纪萍，2009：25~63）。

2. 小农经济存在的必然及其困境

我国农业依然维持着小农经营的方式，有着现实的客观原因和制度原因：一是与农地的初次分配有关，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家庭承包制度决定了初次分配的小规模和分散经营特点；二是与农地的再次分配有关，虽然目前多地通过农地流转和发展农民合作社来实现农地的规模经营，但是其中仍然存在诸多阻碍。另外，农地流转相关法律制度不尽完善、相关制度的配套改革没有跟上、农民的利益没有得到较好的保障等因素也制约着农地经营发展规模。城乡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市民化及市民身份依然很难实现，最终返乡成为众多农民工的选择，这种选择也使得土地的承包权成为返乡务工者的生存保障，而他们不会轻易放弃承包权，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土地的自由流转。

费孝通（2001）通过对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出了《江村经济》一书，对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同时也分析了传统经济背景的重要性及新动力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强调农村当时的形势是传统的力量与新的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虽然费孝通只是小范围的深入实地的调查，但是反映的却是中国农村普遍的生活状况和一系列由社会变迁引发的社会问题。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城镇化建设转移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民工潮的形成促进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到2012年我国非农就业人数已经超过了5亿人,而农业就业人数不足2.6亿人(国家统计局,2013)。劳动力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地关系的矛盾,使农业朝着去过密化的方向发展,但是集体土地产权集体所有及家庭土地面积小的情况依然存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的经营模式。

对于小农经营模式的弊端及症结,不同的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解决路径。首先,土地承包责任制对于当前半工半耕的小农经营模式的存在有着重要的作用,为此土地的规模集中和连片经营成为解决小农经济的出路之一,土地流转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但是我国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极其不明确,在一定程度上也固化了小农经营的模式。产权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斯(1960)从正面指出了产权的经济功能:其能有效地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从而从制度上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产权经济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个产权是明确的、专有的、可转让的、可操作的。但是我国的土地产权制度因其不明确性而导致了土地流转受到限制,不能形成自由的土地市场。我国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周其仁(2014)认为,土地流转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和其他农产品一样可以转手买卖,生产农产品的要素——包括土地——终究也可以转手买卖。从产品市场到要素市场,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由于产权的集体所有,从法律角度分析,农村的土地及其他生产性资源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也有权进行农村生产资源的使用与配置,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农民集体与国家的权利关系一直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即使规定土地属于农民集体,但是如何使用、如何处置、如何经营还是受到一定的限制。对于产权不明的而导致的农产生产低效的问题,周其仁(2014)认为:要真正释放农村的经济潜力,还需把实际的财产权利——也就是农民运用一切资源的自由行动边界——一项一项地界定清楚。集体制下的农民产权再界定,这就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

3. 半工半农的经济形态及其脆弱性

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传统单纯依靠农业生产而生存的农民,因农业收入不足而被迫外出打工,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及市场经济的风险性,使得外出务工者要依赖于农村家庭的小规模农业经营作为最后的生存保障,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半工半耕的生存模式。

黄宗智(2011)认为种半耕半工的小农经营模式的存在除了上述制度

性因素，还有一定的组织性因素。根据恰亚诺夫的小农理论，今天的农民家庭是一个集生产与消费为一体的单位，为了家庭的生存，他会做出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单位的抉择：会愿意以低于市场工资的报酬种植承包地，结合主要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的使用。过去种植业是主业，打短工、手工业是副业；而在半耕半工的模式下，农业生产成为副业而外出务工成为主业。这种半无产的农户同时从事农业生产和外出打工，是出于农户经济单位的组织性逻辑，当然也部分地因为国家政策的抉择。

小农经济的存在有其制度和现实因素的必要性，但是小农经营模式因其规模小、产出低、效益低而导致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投入意愿低，使得农业生产陷入一个无发展甚至停滞的状态，这种现状的存在难以摆脱农村经济的脆弱性，也不利于农村经济的长期发展和农民家庭的生产。

而在市场快速发展、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存在的境况中，我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对于小农经营的持续存在，贺雪峰（2013）认为“从目前中国农村情况来看，小农经济还将长期存在，具体地讲，9亿农民和2亿多户小农中的绝大多数人还将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依托于农业和农村，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再生产模式也将长期存在”。而且他认为土地集体产权所有制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而关于“半工半耕”的家庭经济模式，或按照本文的表述“后集体土地产权的小农经济”，通过具体的个案去剖析其脆弱性，可以为探究中国农村经济如何走出困境提供最基本的认识。

本文将从消费模式的角度，对安徽皖北县园村近十年来的农业经济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做比较，探究后集体土地产权模式下小农经济的特征，以及“半工半耕”经营模式面临全球化时所遭遇的困境，并试图探究中国农村的出路。

三 园村概况及土地使用模式^①

本文进行田野调查的村庄是中部地区的一个典型村落，该村位于安徽省北部的皖北县。皖北是平原农业县，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南缘，属于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但长期以来，由于生产关系的制约，加之自然灾害和历

^① 本研究的资料来自笔者2015~2016年在安徽园村的田野调查资料，部分村落史料引自该县县志。

史上战乱的影响，农业生产缓慢，工业基础薄弱。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尤其是1978年以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得到了一定发展。当地传统的粮食作物以小麦、山芋为主，经济作物以棉花、大豆、油菜为主。

目前园村的总人口在1500人左右，在人口结构上一直呈现男多女少的状态，男性800人，女性700人，20岁以下的占22%左右，20~55岁的占67%，55岁以上的占11%。农村劳动力占总人口的67%，从20世纪末开始，外出打工成为一种大潮，园村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外出劳动的已占总劳动力人口的80%以上。现在园村主要是留守老人在进行农业生产。

园村目前约有1500亩耕地，人均土地0.9~1亩，人地关系一直以来都较为紧张，户均土地普遍维持在4~6亩。园村农户家庭的土地分布和许多华北地区的家庭农场类似，一个家庭的土地是由一些分散的一条一块的耕地组成的，分布在村庄及村庄附近不同的位置。不同于南方拥有较长的无霜期，园村实行一年两季耕种模式，每年10月到次年6月是冬小麦的生长期，6~10月是玉米、大豆等作物的生长期，复种指数比较低，农业产出相对比较少，农民的生活一直拮据，这也是安徽北部的农业生产一直低于安徽南部的原因之一。黄宗智对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区域的农村进行比较后发现长江三角洲的农村比华北平原的要相对稳定，部分原因就是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相对不稳定，农民收入较低。

1949年以前，园村保持着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单家独户的小农经营模式。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土地革命，将地主的土地收归国有，并且分给农民。园村的土地革命基本上在1952年结束，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集体化运动。集体化主要的理由是：动员农村剩余劳动力将会增加农村的资本形成，因而汇总增加生产（林毅夫，1993）。在园村的村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来描述集体化运动：“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组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然而集体化的运动并没有达到最初设想的目的。1978年之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以家庭为主体的独立经营的现代小农模式。之后，园村的土地划分也几经变化。1982~1994年分田到户至土地二轮承包时期，园村采用“宅田合一”的土地划分方式，1982年分田到户时，坚持的是“平均主义”原则，宅基地和田地的面积必须挂钩，即“宅田合一”，而且土地划分细碎，同质土地等额分配。1994~2003年，第二轮延包后，宅基地管制更加严格，

基层政府通过收农业税和执行计划生育加强对乡村的控制和渗透，宅基地的取得、建房要审批，而耕地的使用模式、经营权也受到严格的管理。1994年，为了明确和落实税费责任，加之人口结构变化的驱动，“生添死减”，排除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园村重新进行了土地调整。在此之后，园村的大部分土地就没有动过，基本保持“生不添，死不减”“三十年不变”的情况。至今30年的期限还没有到，土地的划分也会一直维持当前的状况，之后是什么样的情况，农民也是没有明确的看法。

在1982年按照“宅田合一”进行土地划分时，土地基本分在宅基地附近或者村庄的周围。宅基地附近的耕地实质上是农民在集体化时期自家的自耕地，一般土地面积较小，小到一二分地，最多的是八九分地，这种土地规模是不适合种植粮食的，于是农民会在这些偏小面积的土地上种植蔬菜，满足自需和获取额外收入。而在村庄周围的地块面积稍微大些，但也基本上维持在1~2亩，农民会种植粮食，如小麦、玉米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生产的激励性是短暂的，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业生产的增长处于停滞阶段。在人多地少的状况下，园村的农户为了维持家庭的生存与再生产，一般会采取黄宗智所说的“过密化”的经营模式，在农业生产中投入大量劳动力，劳动集约程度提高，导致单位劳动面积的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呈递减的现象。

园村不仅人均土地占有量少，而且土地划分比较分散。笔者询问了园村的一些村民，他们都说土地分得太散了，面积也小，每家耕地四五亩，土地分散在三四个地方，平均每块地面积1亩左右。这种细碎的地块划分，造成农业生产效率低，同时也导致一些村民因为地界不清而产生纠纷。

笔者通过访谈了解了园村村民家庭的土地拥有及分布状况，同时通过对园村的原支书访谈得知园村的村民在土地的拥有和分布上有较强的相似性（见表4）。

表4 园村一些村民的土地分散状况

村民	家庭人口数 (人)	家庭土地面积 (亩)	家庭土地分布	每块土地的面积
代民	6	7	分布五块	最大的2亩
刘华	5	5	分布四块	最大的1.5亩，最小的0.5亩
丁军	4	3.9	分布三块	大的1亩，小的0.5亩
白辉	4	3.6	分布四块	0.8亩左右